

数字帝国主义算法控制下的 意识形态风险及防范*

李江静

【内容提要】作为数字帝国主义时代资本统治的新形式，算法控制主要体现为控制大量的用户数据、控制可供用户获取的内容和控制用户的注意力时间。算法控制的产生源于数字技术的垄断资本主义应用，其受“谋求攫取剩余价值”和“扩展政治权力”的运行逻辑支配渗透进社会生活，在削弱坚守理想信念的共同利益基础、形成并加剧舆论偏见、消解人的主体性等方面带来严峻风险挑战。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防范意识形态风险，需要驾驭数字技术，冲破算法控制构筑的“思想牢笼”，完善数字治理体系和强化价值引领，加快数字中国建设，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打造繁荣自信的数字文化。

【关键词】数字帝国主义 数字技术 算法控制 意识形态风险

作者简介：李江静（1988-），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仲英青年学者（北京 100084）。

近年来，数字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席卷全球，使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日益呈现出以数字技术为支撑、贯通线上与线下、打破时空与场景限制的全新形态。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万物互联与算法优化在诸多方面助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生活品质的提高，但同时，以算法为核心的数字技术与帝国主义结合共谋，推动算法日益成为异己的、具有深层次控制力量的统治形式。算法控制的出现与数字技术受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优先掌控的阶段性特征密切相关，其本身也体现为数字时代的文化霸权，延续并加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侵蚀。在一个“数字化”作为显著标识且带来严峻挑战的时代，防范算法控制带来的意识形态风险不仅是大变局下经受住“重大考验”的题中之义，也是一个事关加快数字中国建设、打造繁荣自信数字文化的重要课题。

一、算法控制：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统治新形式

20世纪初，列宁立足“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① 转折点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况，运用唯物史观对帝国主义这一更加具有“寄生性”和“腐朽性”的“垄断资本主义”作了全面客观的分析，提出了科学的帝国主义论。作为当代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与数字技术结合共谋产生的帝国主义新样态，数字帝国主义依托算法控制这一新形式，在新的时代条件下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研究”（22VSSZ043）的阶段性成果。

①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5页。

延续并加剧了资本统治。

1. 垄断资本主义全面渗透数字领域催生数字帝国主义

近年来，各类数字技术快速迭代、迅猛发展，“数字化”日渐成为当今世界生产生活方式的鲜明标识。当代垄断资本主义集团为持续攫取剩余价值、扩展政治权力，开始充分运用以算法为核心的数字技术输出文化和价值观念、阻遏新兴经济体崛起，力图迫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其“经济附庸”“政治臣民”与“文化奴隶”。在此背景下，数字技术实际上充当了帝国主义国家凭借其技术主导地位维护全球霸权、盘剥发展中国家的新型手段。数字技术的帝国主义运用推动帝国主义完成了“数字化”的模式衍变，即“数字资本同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土地资本融合起来的少数垄断寡头”^① 依托其垄断地位操纵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市场、劳动力和意识形态，用全新的方式不断实现更大程度的资本统治。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工业部门和各个国家的发展必然是不平衡的，跳跃式的。”^② 该论断实际上揭示了帝国主义这一“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性。作为垄断资本主义在数字时代的新变化，数字帝国主义的生成及发展也应当首先从生产力出发进行考察。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纵深推进同步，数字技术的运用场景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拓展，其中至少有四个方面的特点值得关注。一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深度应用，平台企业自动采集、分析、生产海量数据的能力大幅度跃升，生产方式的数字化程度前所未有且与日俱增。二是生活方式与工作方式的数字化转型势不可挡，线上与线下的界限在深度交互、彼此融合、双向渗透的过程中开始模糊，缺场空间与在场空间的对立出现弥合，依托数字技术建构的数字空间日渐泛在化^③。三是5G等信息通信技术和Web快速革新，“万众上网”“万物联网”越来越融入日常、成为平常，数字技术所承载的信息流得以更便捷地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连接。四是为解决信息过载问题而产生的推荐算法全面渗透人们的数字化生活，平台企业通过分析和追踪用户的网络行为偏好，实现对于海量数据的准确评估和精准适配，垄断了广大用户在信息获取和文娱购物等诸多方面的个性化服务供给。一句话，人们的生产生活已经日益被数字技术所统摄。

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生产力飞速发展是数字帝国主义生成的基本前提，但这只是提供了可能性，特定生产关系导致数字技术的垄断资本主义性质的应用才是这种可能性转向现实性的关键所在。早在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马克思就用“工人被当做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的表述犀利地刻画了“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即蒸汽革命背景下机器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带来的“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④ 的颠倒情形。19世纪末期，电气革命有力促进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资本主义由此迈入帝国主义阶段。在帝国主义初期，“生产社会化了，但是占有仍然是私人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仍旧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⑤。此时，技术的垄断资本主义应用推动“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成为金融资本且“必然变为金融寡头的统治”^⑥，进而导致帝国主义以修铁路、办工厂、开矿山等形式对后发展国家进行资本输出和经济掠夺。而不同垄断资本集团争相对后发展国家进行资本

① 刘红玉：《西方数字帝国主义的形成及垄断新样态——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文化软实力》2020年第1期。

②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0页。

③ 参见刘少杰：《网络化的缺场空间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调整》，《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5年第1期。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7、289页。

⑤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6、116页。

⑥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6页。

输出,造成集团之间为划定势力范围不断开展包括但不限于战争在内的斗争,更是加深了后发展国家的苦难。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来,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并未发生改变,各类数字技术连同海量数据转变为数字资本并与金融资本结合,平台企业为争夺垄断地位展开激烈竞争^①。与金融资本相结合的数字资本只是垄断资本集团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加深劳动对资本隶属程度、源源不断攫取更多剩余价值的新抓手,它带来的依旧是“少数人牟取暴利的自由、发财的自由、商业周转的自由”^②。此外,垄断资本集团还着力在利用数字技术增强经济控制力的同时提升其政治影响力与文化塑造力。总体而言,当垄断资本主义对数字领域全面渗透并与之形成结合共谋之势,数字技术就沦为资本攫取剩余价值、干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催生了基于数字资本霸权的数字帝国主义^③。

2. 数字帝国主义时代资本统治程度加深导致算法控制

所谓算法控制,本质上是资本凭借其以对算法为核心的数字技术的垄断,来实现对人的总体性控制,使人被“整合”或“一体化”,“不再与已确立的社会相矛盾”^④。算法控制可以具体化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控制大量的用户数据为前提条件。大数据技术的高速发展支撑了算法的广泛运用,对于用户包括但不限于身份、偏好、网络行为等隐私信息聚合的程度,决定了算法功能实现的程度。而算法控制正是在对劳动者生产生活过程进行立体化的数据记录、收集和整合分析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构成了算法控制的前提条件。二是以控制可供用户获取的内容为直接体现。推荐算法作为在传播领域的主导算法,它通过基于内容、协同过滤、实时热点、相似语义等模式,建立起广大用户与数字空间中海量信息的精准化适配。换言之,什么样的传播内容应该予以推荐、向谁推荐、以何种优先级推荐,均取决于推荐算法的内在标准。三是以控制用户的注意力时间为重要方面。注意力时间指的是用户在特定事物上专注投入的时间。算法依托大数据技术的有力支撑,对用户的偏好加以分析与评判,力求实现内容与产品的精准推荐,进而形成对用户兴趣的持续有效刺激,用户原本就有限的注意力时间被越来越多地限制与锁定在相应平台上。

算法控制的产生源于数字技术的垄断资本主义应用,受到攫取剩余价值逻辑和扩展政治权力逻辑影响,正是这两条逻辑的展开使算法控制成为必然。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⑤在获取垄断利润这一强烈动机的驱使下,平台企业凭借其对数字平台这一数字时代劳动资料的垄断,充分运用数字技术布下搜集各类用户个人隐私的“天罗地网”,持续掌握海量的各类用户数据并将其转化为劳动对象,这就完成了算法控制首要条件的准备。在此基础上,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剩余价值及其转化形式——利润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因此,垄断着技术和数据实际上也就垄断了传播资源的平台企业的行为偏好:为了牟取更加庞大的商业利益,什么样的内容可以汇聚更大的流量,推荐算法的权重就向着什么样的内容倾斜和侧重。加之打破工作日的限度、以更加具有隐秘性的方式剥削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始终是资本的志趣所在,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通过控制劳动者的注意力时间吸取源源不断的无酬劳动成为数字资本的必然选择。与此同时,由于“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⑥,因此,资本的运动过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势必伴随相应的政治诉求用以保障和巩固资本统治。当前,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

① 参见蔡万焕:《从金融资本到数字资本:当前美国阶级结构变化的新动向》,《山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② 《列宁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28页。

③ 参见李江静:《帝国主义与数字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7期。

④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2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36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页。

资本集团依靠传统的政治、经济手段对本国进而对其他国家的劳动人民进行压迫已日渐式微，而依托数字技术强化其政治影响力、文化塑造力以服务其攫取垄断利润的图谋却日益深化与铺展。在数字生产资料为垄断资本集团所占有的情况下，算法无可避免地蕴含了其实际所有者的、契合资本逻辑的价值取向，当这种取向通过特定方式反映出来时，呈现在大众面前的则是明显带有价值输出、文化渗透乃至具有政治煽动色彩的内容。

综合来看，现阶段的生产关系决定了算法控制实际上是资本统治的全新形式，只不过“统治者”由帝国主义起始阶段的金融资本转变为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的、与金融资本相结合的数字资本，并且，其统治程度伴随劳动对资本实际隶属的加深而提高，统治范围也从经济政治领域进一步向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拓展。

二、数字帝国主义算法控制下的意识形态风险识别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东升西降”“社升资降”的趋势日益显现，帝国主义借助数字技术等新兴科技对中国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绝非危言耸听，意识形态风险植根于经济、发端于思想、发酵于舆论、显现于政治的特征更为明显。算法控制作为数字帝国主义时代资本统治的新形式，受谋求攫取剩余价值和扩展政治权力的运行逻辑支配渗透进社会生活，在削弱共同利益基础、加剧舆论偏见、消解人的主体性等几个方面给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严峻挑战。

1. 算法控制的运行逻辑削弱坚守理想信念的共同利益基础

数字技术以相对隐蔽的方式完成对大量用户数据的控制，它为算法控制及其背后攫取剩余价值的运行逻辑发挥着不容小觑的支撑作用，由此导致的整体利益削弱和个人利益膨胀极大动摇了坚守理想信念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深刻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①，这意味着思想不会也不可能脱离现实的物质利益关系独立存在。数字帝国主义时代，数据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生产资料并被垄断资本集团控制。人们“日用而不觉”地在数字平台持续投入注意力时间——其实质就是将用户的网络行为、隐私信息全部转化为免费提供给数字资本的数据“原料”。掌握了数据“原料”的资本运用其所支配的数字平台对数据生产要素进行加工，进而完成数据商品的生产 and 流通过程——剩余价值也得以产出和实现。不可否认，数字技术与资本的结合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开辟了经济增长的崭新空间；但同时，也绝不能忽视资本的逐利本性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垄断资本主义性质应用所带来的风险隐患。一方面，受限于数字帝国主义的生产关系，通过算法技术积累的大量财富被少数人所占有、被资本所攫取并为扩大再生产服务，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由于私有制的作用，这些按照法理应当属于全人类的力量便成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的垄断物，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②。在当今全球范围内，帝国主义国家的核心数字公司可以凭借其对于算法技术的垄断地位，通过数字资本输出、数字商品输出、数字资源输出和推动数字寡头同盟成立等方式，用比以往低得多的管理与运输成本获得比之前更为强大的全球财富流向控制力，力求不断巩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中低端地位^③。正因为如此，算法控制也充当了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阻遏的手段。另一方面，垄断资本集团凭借算法对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点滴转化而成的海量数据进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44页。

③ 参见刘皓琰、柯东丽、胡瑞琨：《数字帝国主义的形历程、基本特征与趋势展望》，《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年第1期。

行控制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劳动过程从“有酬劳动”到“无酬劳动”的转化过程，它同时还以温和、隐蔽的方式肢解了工作日的限度，使得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更进一步地转向“实际隶属”。因此，与算法控制相伴相生的是剩余价值攫取方式和程度的重大演进。

就此而言，算法控制及其运行逻辑势必导致经济关系变革和经济利益分化，并进一步地对新征程上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造成新的压力，这导致如何打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共同利益基础成为当前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2. 算法控制对用户可获取内容的操纵形成并加剧舆论偏见

数字帝国主义为了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延续在经济上、政治上的统治，不可避免要依托掌控的算法技术对传播内容的生产、分发和反馈等环节进行全周期操纵，使算法控制直接体现为控制受众所能获取的信息内容。这无疑会导致人们依照片面甚至错误的信息得出对社会事件、国家政策带有明显主观倾向的评判，进而形成并加剧舆论偏见^①。

其一，在传播内容的生产环节，数字帝国主义凭借对数字技术的掌控，在算法设计开发和运营维护的整个周期有能力植入带有鲜明意识形态取向的内容，使得依托算法进行的自动化写作在事件理解、数据取舍、模型构建、结果输出的一系列流程中都能体现资本主义价值观。这一点通常表现为应用算法对社会事件和时事政治采取裁剪新闻标题、拼接影像资料、恶意配音配文和断章取义解读报道的手法。事实上，数字帝国主义也有足够动机凭借自身的技术和平台垄断地位，在划分类别、构建层级、组织培育等手段的掩饰下有针对性地对相关内容生产主体给予收益和流量等方面的倾斜与支持，用以强化对于受众可获取信息内容的控制。其二，在传播内容的分发环节，常见的基于内容和协同过滤的推荐算法看似“为我们每个人打造了一个独特的信息世界”^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用户与信息精准适配，但被垄断资本集团掌控的推荐算法对于用户及其行为的抓取、解读、应用仍然不能跳出为其经济政治诉求服务的内在逻辑，进而为受众看似“千人千面”的信息获取划定了隐而不宣的约束条件。此外，现有的推荐算法也会在相当程度上使得人们处于同质化信息的反复喧嚣中，受众视野窄化、思想僵化、观点极化的风险悄然增加，不利于人们思想的整合统摄。其三，在传播内容的反馈环节，用户通过评论、打分等参与感和体验度较高的行为看似获得了对信息内容进行评价的权力，但垄断性质的大型数据公司依旧可以凭靠算法操纵评论留言的显示和置顶标准，以此达到引导和操纵舆论的目的。因此，算法的垄断资本主义性质应用实际上完成了对受众反馈什么、如何反馈的方向性引导——这一反馈方向无疑与服务于资本利益密切相关。

还需要看到的是，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内，从素材采集到内容制作再到产品发布的全链条传播资源基本都由主流媒体统摄，主流媒体也因此获得了校正舆论偏差、提振主旋律声量的天然优势。然而，这种优势随着算法逐渐主导传播内容的生产、分发和反馈过程而走向衰落，日益让位于算法技术处于支配地位的数字平台。这一流变趋势实质上反映出，数字帝国主义依托算法控制推动当今世界的传播权力结构与媒体组织格局发生了有利于垄断资本集团的转变。在此背景下，原先主要由主流媒体输出的舆论“正见”遭受冲击，取而代之的是受资本逻辑支配的舆论“偏见”生成，并在社会生活中不断渗透、植入和强化。

3. 算法控制对用户注意力时间的掌控造成人的主体性消解

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算法控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控制用户的注意力时间，其实现机制在于各类

① 参见万欣荣、陈珂：《算法意识形态下舆论偏见的形成与治理》，《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② [美]伊莱·帕里泽：《过滤泡：互联网对我们的隐秘操纵》，方师师、杨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8页。

数字平台依托算法技术对受众偏好的精准把握，不断将人们有限的注意力时间锁定在平台及其“精心”挑选的内容上，以貌似温和、相对隐蔽的方式对人的主体性造成消解。

算法控制所体现的“精心”挑选具有两方面意蕴：一是算法着力对切合用户分众化、个性化兴趣的信息组合进行精准推送。从总体上看，人们通常偏好简单、休闲、轻松、愉悦的传播内容，但对严肃、权威、专业、深刻的议题相对难以倾注持续的注意力，这导致无论从数量上和还是规模上算法都更多地推送带有泛娱乐主义和消费主义色彩的内容，而在近乎全员全方位数字化生存的当下，这也意味着与之相关的错误思潮日益向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与之相反，主流意识形态的相关内容可能由于受众的拒斥而被推荐算法过滤、忽略甚至无视，形成“价值缺位”“精神空场”“意义虚无”的危险局面。二是受制于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算法还可能“精准”推送不直接贴合用户兴趣偏好的其他信息，比如对公共政策和社会事件有特定取舍和选择地报道或戏谑，以及勾连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等错误思潮的相关内容。

早在20世纪90年代，布热津斯基就提出了“奶头乐”理论，即通过过度化、低俗化的娱乐和消费内容供给麻醉和控制普通公众，消除其抗争想法与阶级仇恨，进而缓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①。某种程度上，数据驱动的算法控制为“奶头乐”理论在数字时代深入实践提供了便利：当注意力时间被非人格的、异己的、客观的社会形式所统治，人作为主体的自主性便会大打折扣并沦为被支配对象，这导致人不会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审思和批判，反倒会对资本所建构的消费叙事、所追逐的功利感性、所展现的光怪陆离产生深入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的认同。如果由此导致的蔑视理想、耻言道德、逃避崇高和一味追求感官刺激和物质享受等错误价值取向不能得到有效遏制，长此以往将不免造成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供给不足、覆盖不全、引领不力的深层次风险隐患。

当前，一种观点认为，数字领域的战略竞争取代意识形态竞争构成了当前大国竞争的主要动力^②。事实上，大国竞争中的意识形态纷争远未偃旗息鼓，围绕以算法为核心的数字技术及其运用展开的大国博弈正在构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内容。

三、数字帝国主义算法控制下的意识形态风险防范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指出：“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③ 算法控制在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的出现则是意识形态领域“重大考验”的一个显著表现，它表明帝国主义利用新兴技术强化了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的精神操纵和价值观入侵，使之在经济霸权、政治统治的推进中扮演关键角色。事实证明，数字技术并非价值中立，而是有可能服务于资本逻辑的意识形态力量，这迫切需要我们增强数字技术的驾驭能力，防止数字技术和资本逻辑合谋共生危及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同时注重完善数字治理体系和强化价值引领，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打造繁荣自信的数字文化。

1. 驾驭数字技术，冲破算法控制构筑的“思想牢笼”

应当认识到，“数字帝国主义”不仅指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数字技术优势，“以数字剥削取

^① 参见余东华：《警惕西方“奶头乐”战略对中国主流价值观的侵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7期。

^② 参见阎学通、徐舟：《数字时代初期的中美竞争》，《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1期。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6页。

代传统帝国主义的掠夺方式，这种跨国剥削比以往更加隐蔽、更加高效”^①，而且在文化意识形态层面描绘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利用文化产品、传统媒介为载体，后来又借助信息技术、网络媒介再到今天依托高科技的数码产品、数字平台等数字技术进行文化输出和价值观渗透。算法控制的出现与此密切相关，其依托意识操纵或精神控制，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延续帝国主义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全球统治，使之服务于自身资本输出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压榨与盘剥的目的。因此，“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的最大隐患”^②。这就需要我们牵住数字技术特别是算法技术从研发到应用的这个“牛鼻子”，以此冲破算法控制所构筑的隐形“思想牢笼”。

从国家层面谋划加强数字技术攻关和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科技、经济意义上的固本之举，也是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特别是对冲隐蔽性渗透的长远之策。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有必要大力加强政策倾斜、资金投入和协同攻关，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结合起来，将各个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强化《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的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和数字安全屏障“两大能力”^③，着力掌握数字发展主动权，在数字领域特别是算法相关的基本理论、基础技术、非对称技术、颠覆性技术上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真正从根本上破除帝国主义希望凭借数字霸权将我国锁定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低端位置的企图。

与此同时，“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④，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类主流媒体，要切实担负起作为重要思想舆论阵地的重大责任，坚持技术驱动引领，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重大变化。当前，数字技术特别是算法的深化发展推动传播领域呈现出越来越清晰的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趋势，各级各类主流媒体应当借助新时代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东风，把握政策契机和资金红利提升数字技术驾驭能力，在中央厨房建设、客户端升级改造、新媒体矩阵构建、“党媒算法”运营等方面多措并举，着力建立和巩固主流媒体参与数字时代传播内容生产、分发、反馈的全链条竞争优势。

在“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契机下，宣传、网信及其他相关部门也应持续追踪数字技术特别是算法发展的前沿动态，不断提升对变革性技术的科学认知能力、系统管控能力和有效运用能力，技术赋能建设强大的网络舆情预警分析机制和应急处置机制，实现“以技术对技术，以技术管技术”^⑤。只有充分发挥人之于技术的主观能动性，合理设置监管流程和把关机制，通过人工编辑和管理员的介入等方式强化干预，才能更好规避“技术独裁”导致的系列深层次风险，将掌握意识形态管理权落到实处。

2. 完善治理体系，规避数字资本无序扩张削弱共同理想

习近平指出，“我国数字经济在快速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不规范的苗头和趋势”^⑥，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资本无序扩张。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数字治理体系，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将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有机结合起来，重点引导数字资本在健康的轨道上平稳发展，以此作为规避算法控制造成意识形态风险的重要方式。

在数据转化为生产资料的过程中，切实统筹发展与安全。人们的隐私信息、网络行为伴随注意力时间的倾注而被转化为被数字资本无偿获取的数据“原料”，是算法控制的维度之一，这也构成

① [美] 弗兰克·卢斯夏诺：《数字帝国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黄华莉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5期。

②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页。

③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https://www.gov.cn/xinwen/2023-02/27/content_5743484.htm。

④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81页。

⑤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95页。

⑥ 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求是》2022年第2期。

了数字平台持续获取利润的重要基础。对此，一方面，要把握重点，强化数字技术特别是算法及其应用载体的监督监管，突出维护数据收集和利用过程中的消费者权益、隐私信息安全、良好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环境，确保“数据资源规模和质量加快提升”^①的进程稳定可持续。另一方面，要管控风险，探索从法律法规层面规制数字技术的应用尤其是算法控制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和侵害，特别是要依法严厉打击向境外各类主体甚至是敌对势力提供用户行为数据的行为，确保平台企业规范健康发展。

在消费环节，推动数字消费行稳致远可持续。数字技术特别是算法对人们消费行为的监控和操纵是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独特的消费图景，依托数字金融产品进行的超前消费、透支消费、盲目消费加剧了消费数字化与数字消费化的交织，为消费主义、泛娱乐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滋长提供了温床。对此，要着眼于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金融风险，巩固对平台企业金融业务专项整改的系列成果，优化对触发消费主义的相关金融产品的监管，规避数字资本过度金融化；同时，完整准确地理解“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②的科学内涵与实践要求，积极培育和倡导健康的数字消费观念，规避依托数字技术及其应用载体的过度消费造成的对人们价值观念的侵蚀。

在分配环节，注重释放各类数据助力共同富裕的价值潜能。数字领域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数字经济治理的推进，使得依托大数据进行动态监测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公共数据的汇聚利用和分配格局的优化改善成为可能。例如，海量的经济行为数据能够成为研判平台垄断和资本野蛮生长的重要参考，监管部门可以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加以规制，避免资本无序扩张拉大贫富差距。此外，伴随数据资产计价研究的深入，个人凭借出让自身相关数据的使用权参与分配也应当成为可探索的方向。税务等部门还可以通过建立更加全面细致的税务信息大数据系统来强化税收监管和税务稽查，为政府再分配提供有力支持，从而夯实支撑共同理想的利益基础。

3. 强化价值引领，切实打造以人民为中心的繁荣数字文化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鲜明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③。这是着眼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的重大论断和重要任务，进一步凸显了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的重要地位。然而，伴随数字帝国主义而生成的算法控制日渐成为支配人、改变人乃至控制人的“异己力量”，使人的主体性遭到消解，助推了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错误社会思潮在数字空间蔓延。鉴于此，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切实打造自信繁荣的数字文化。

首先，加强优质数字文化产品供给。当前，算法受资本逻辑支配，导致大量娱乐化、碎片化的传播内容挤占了用户的注意力时间，从而加剧了更具理论性和严肃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难度。因此，如何以话语创新为抓手丰富优质数字文化产品供给，是一个十分重大而紧迫的课题。要想持续输出更能被人民大众所接受、理解和掌握的信息内容，不仅需要持续推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创新与转换，而且需要大力发挥主流媒体的作用和注重发掘、培育一批活跃在各类数字平台的“文艺轻骑兵”，切实激活广大人民群众建设数字文化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之成为参与优质网络文化产

①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https://www.gov.cn/xinwen/2023-02/27/content_5743484.htm。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9、30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2页。

品供给的“生力军”。

其次，提高舆论受众的数字媒介素养。所谓媒介素养，是指从基本的使用媒介到对媒介信息作出判断分析、进而再到利用媒介参与内容创造的能力^①。在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数字空间，纷繁复杂的信息内容交织交融、鱼龙混杂，如何增强舆论受众的媒介认知能力、价值判断能力、信息筛选能力，就成为提升人们媒介素养的重要方面。对此，一是要强化理论支撑，在媒介素养相关学术研究领域推进有组织科研，不断加深对于数字时代信息传播规律的认识。二是应探索将媒介素养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加快推进课程研发及教材编撰，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引导学生对媒介信息的特征、功能和舆论偏见、推送失衡、传播走样等现象形成判断能力。三是要引导媒体机构和数字平台承担社会责任，以增加算法的透明度为重点，切实提升公众对于算法推荐信息的筛选能力^②。

最后，强化建设数字文化的人才支撑。打造自信繁荣的数字文化，人才是第一资源。鉴于当前数字文化高端人才供给相对不足而制约数字中国发展的现状，在人才培养方面，有必要创新学科设置和布局，加强新闻传播学、人工智能、数字媒体艺术、影视摄影与制作、文化产业管理等专业的交叉交融，使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的不断提高形成对数字文化建设的有力支撑。在人才选拔方面，要实施更为积极和有效的人才政策，重点围绕优质数字文化产品从创意、策划到生产、运营和推广的全流程引智聚才，兼顾数字文化治理和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的人才任用，用更适应数字化发展的方式给予人才更大自主权和主动性，形成智力赋能数字文化建设的强大合力。

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的算法控制表明，垄断资本主义依托数字技术开拓了发展的全新空间，以其隐而不宣、日用不觉的方式加剧了意识形态操纵和价值观侵蚀。尽管在“东升西降”“社升资降”的大趋势下，帝国主义越来越受到社会主义等致力于人类进步崇高事业力量的牵制，但帝国主义也势必为了巩固自身的垄断地位而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遏制和打压。因此，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我们更要深刻把握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算法控制的实质，认清算法控制导致的意识形态风险隐患，加强数字技术攻关和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治理体系和强化价值引领，在建设数字中国的进程中切实提高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意识和能力。

参考文献：

- [1] 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 [2]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
- [3] [美] 伊莱·帕里泽：《过滤泡：互联网对我们的隐秘操纵》，方师师、杨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
- [4] 刘皓琰：《数字帝国主义》，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23年。
- [5] 邓伯军：《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逻辑批判》，《社会科学》2020年第8期。
- [6] [俄] Г. А. 久加诺夫：《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在全球化时代仍具有现实意义》，晓华编译，《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6期。
- [7] Christian Fuchs, *Digital Labor and Karl Marx*,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编辑：张建刚)

① R. Hobbs, “Media Literacy, Media Activism, Telemedium”, *The Journal of Media Literacy*, Vol. 42, No. 3, 1996.

② 参见耿益群：《信息疫情背景下媒介素养的新发展：海外经验与中国策略》，《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8期。